

# 1930年代国联教育考察团对 民国中等教育改进的影响

张学强

(西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 应南京国民政府的邀请, 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于 1931 年对中国进行了访问, 并将其对中国教育现状的考察意见与建议编纂成《中国教育之改进》这一报告。报告中以较大篇幅关注了中国中等教育的情况, 指出了当时中等教育中存在的教学组织制度不合理、课程设置混乱、教学内容脱离生活实际、长期忽视职业教育等问题。并建言国民政府教育部门废除不符合中等教育发展规律的“分科制”与“学分制”, 建立完整的中等职业教育体系, 改革教学方法与考试形式。该报告书关于中等教育的建议对 1930 年代民国中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

**关键词:** 国联教育考察团 《中国教育之改进》; 民国; 中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 G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46 (2017) 12-0244-08

1931 年 9 月, 应南京国民政府之邀, 国际联盟组织派遣四名来自欧洲的教育学家组成国联教育考察团前往中国进行调查访问。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政府牵头、国际组织参与的对中国教育事业的评估活动。考察团通过各种途径对当时中国的教育现状进行“概括的考察, 作系统的报告”<sup>①</sup>, 并在其随后提交的考察报告中对了解到的中国教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批评、分析和建议。

## 一、国联教育考察团来华的背景与过程

1927 年,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中国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国民政府意识到在整个 20 世纪前期中国教育“美国化”的进程中, 教育固然取得了长足进步, 同时也带来了诸多弊端。1929 年国民党“三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决议案》中就指出“于中国现在之教育, 无论为学生, 为教员, 为主持教务者, 乃至为掌理教育行政之人, 皆怀不满之心理。上下交相不满, 乃至教育与社会亦相互隔离。而整个中国教育, 乃露陈其弊端与危机。”<sup>②</sup> 国民政府在报告中痛斥当时的中国教育存在着“学校滥、办学之人滥、师资滥、教材滥、招生滥、升学滥”<sup>③</sup>。因为这“六滥”的存在导致了“学校往往成为个人制造势力之工具, 一恶也。教员与学生虽有天才, 亦遭其伐贼, 二恶也。不能养成一般青年之学问品格与技能, 只足增高青年放浪之精神与物质之欲望, 三恶也。为社会增加分利失

**作者简介:** 张学强, 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 教育史。

① 李建勋 《李建勋教育论著选》,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3 年, 第 252 页。

② 《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决议案》, 《中央党务月刊》1929 年第 12 期。

③ 《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决议案》, 《中央党务月刊》1929 年第 12 期。

业之徒，为国家斫丧民族托命之根，四恶也”。<sup>①</sup>

这些恶果“害个人、害社会、害国家”。<sup>②</sup>有学者直言，当时中国教育失败的真正原因在于：“从事教育者没有教育的全部知识，因而未能认清其内容，了解其功能，以致盲目抄袭、随意乱动，因而形成现在教育之危机，这就是中国教育的病源。”<sup>③</sup>

另外，以胡汉民为代表的部分国民政府高层更加欣赏欧洲教育经验，一方面，因为他们认为当时中国教育中存在的“自由主义”风气是由于教育界盲目学习美国造成的，这种风气与国民政府希望加强对学校的控制、严肃学校纪律的方针相违背；另一方面，与1929年开始的美国经济大萧条有一定关系。

1930年2月26日，吴稚晖当选世界文化合作委员会委员，为中国与国际教育组织合作奠定了基础。同年3月6日，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陈布雷致电国际联盟秘书处，希望能得到国联下属文化合作机构的帮助，从而加强中国与国联各成员国之间科技、文化、教育方面的联系。4月25日，行政院副院长宋子文致电国联秘书长，提出了六大合作建议，其中第五条为“盼贵会协助中国聘请顾问，襄助中国教育制度之改进，并为中国与外国文化中心机构互相沟通”。<sup>④</sup>1931年5月18日召开的国际联盟第十三届行政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关于邀请国联考察团的提议，并指令“关于教育制度及沟通中外文化事业中心诸问题，亦由秘书长交由国联文化合作委员会，令其执行机关国际文化合作院教育电影院实行”。<sup>⑤</sup>

根据国联行政会议的决议，国联文化合作委员会于1931年8月底组织了国联教育考察团，从瑞士日内瓦出发，前往中国。考察团由一批对教育见解颇深的专家学者组成，其主要成员有德国柏林大学教授柏克，他在代表团中担任团长一职，负责考察中国中学教育和教育制度中的问题；波兰教育部初等教育司司长法尔斯基教授，负责考察中国职业教育的问题；法兰西大学教授朗之万，负责考察中国自然科学和技术教育问题；英国伦敦大学教授汤尼，负责考察中国高等教育制度问题。1931年9月30日，考察团抵达上海，并在国民政府教育部代表的陪同下前往南京，在南京拟订了整个考察计划，随后便辗转北平、天津、河北定县、苏州、杭州、无锡、镇江、广州等地考察中国实际的教育状况。调查过程中，专家们阅读了大量文献资料，收集整理并分析了所考察各地的历史、政治、人口和教育情况，参观了当地的大中小学校和教育行政机关，并与当地的教育行政主管官员和知名教育界人士展开座谈会，以求得到关于中国教育情况的第一手材料。12月中旬，考察团结束工作离开中国。1932年9月，考察团完成其中国教育考察报告书“*The Reorganization of Education in China*”，同年12月国立编译馆将此份考察报告翻译为中文，并冠以《中国教育之改进》之名发表。该报告书共222页，由通论、各论和附录三大部分组成，其中“通论”包含了中国教育之情形、中国教育与外来之影响、教学之精神、语言与文字、教育行政原则、教育财政等内容。“各论”主要由对中国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考察报告和建议组成。“附录”登载了考察团致国民政府教育部关于中国教育改革的初步方案。

## 二、国联教育考察团对民国中等教育的分析与建议

国联教育考察团重点考察了当时中国中等教育的状况，并在报告书第二章做了检讨。其中第二、三、四节分别从普通中学教育、中等师范教育、职业教育三个方面分析了当时中等教育存在的问题，

① 《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决案》，《中央党务月刊》1929年第12期。

② 《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决案》，《中央党务月刊》1929年第12期。

③ 范云龙《今日研究教育者应有的觉悟和认识》，《中华教育界》1931年第8期。

④ 《宋部长与国联秘书长书》，《申报》1931年4月29日（十三）。

⑤ 吴秀峰《中国与国联技术合作之经过》，《民国档案》2003年第2期。

批评了中等教育办学思维僵化、课程设置不合理、“学分制”与“分科制”实施不当、不重视中等职业教育与师范教育等问题。并根据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整改建议，以期能够促使当时中国的中等教育走上良性发展的正轨。

### 1. 考察团对普通中学教育的分析与建议

考察团专家认为普通中学教育是连接各级教育的“枢纽”，批评当时普通中学过于强调理论方面的知识，在学校组织和教学方式方面也过于迁就大学的需要，在只有15%的学生能继续接受高等教育的情况下，这种思维无疑是“贻害青年而已”<sup>①</sup>。考察团专家指出，普通中学教育的培养目的中，进入大学只能是目标之一，更重要的是“造就健全的、活泼的、思想灵敏的人材，关心于其所处之世界，而准备各尽其本人之责任者也”<sup>②</sup>。

在对部分中学进行实地考察后，专家们指出中国的中等学校教育“过于整齐划一”<sup>③</sup>，没有考虑为数众多的中学生的实际情况。而职业科课程太少，“遂致许多并无文科资质的学生，徒因无它科可习，不得不修习文科；性情近于实科者遂无发挥其天资之机会，而国家则由学校造出许多不需要的人材，具有一知半解之文科知识，而不能应付实际之需要”<sup>④</sup>。考察团为改变这一情况，提出了三步走的解决办法：第一，除非是某一地特别需要一所普通中学，且经过教育部门的考察批准方可设立，否则不再设只有普通科的高级中学。第二，各地方应集中人力与财力，建设注重实业课程的中学。第三，教育部应动用强制力，让现有的高级中学在一定时间内证明其具有开设实业课程的师资与设备，否则取消该学校的立案。

值得一提的是，考察团提出普通中学在课程与教学方法方面也应该与实际生活相结合，增加活动课程与课外实习的时间。考察团批驳了活动时间的增加会影响文化学习的观点，认为就算是完全志在文科的学生，也十分需要这一类活动与实习的课程，其原因是这类学生“将来必更完全无时间从事此等工作也”<sup>⑤</sup>。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出发，应该给予其尝试各类工作的机会，“教育若只求死记书本内容，而忽略此种人本主义，真不成其为教育矣”<sup>⑥</sup>。考察团也为如何使中国的普通中学教育更加贴近生活提出了几点建议：第一，大部分中等学校，尤其是初级中学，上课的时间太长。“初中学生应有较多之时间以从事个人爱好之事，应有较多之时间以资游戏，应有较多之时间以作手工。”<sup>⑦</sup>简言之，普通中学阶段的课程要根据学生的实际需要加以删减，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增加课外活动的时间。第二，中学的教学方法应该加以改革，报告书中描述了考察团所见的中学教学景象，“教师在堂上讲演，而默然无声貌似驯良之学生，则从事于笔记，有时教师仅依教本宣读，学生虽亦各有教本，但仍照样笔记”<sup>⑧</sup>。这种教学方法“不但虚耗时间，亦且使学生与教员同感苦恼”<sup>⑨</sup>。考察团认为教师的根本任务，不是向学生灌输知识，而是引起学生的好奇心，并引导他们学习能满足他们好奇心的方法。在实际的教学中，教师应处于辅导者的地位，让学生能自行解决教师指定的问题。学生通过自己收集到的材料，比老师给的板书和笔记更能让人取得进步。而且教师应教导学生“读书而不必尽信书之内容”<sup>⑩</sup>。第三，中等学校应加强科学类课程的建设。考察团提到，科学类课程课时只占中学课程总课时的1/7，且在教授的过程中，往往以老师讲授为主，缺乏观察与实验的教学。对有人提出的

① 国际联盟《中国教育之改进》，南京：国立编译馆，1932年，第115页。

② 国际联盟《中国教育之改进》，南京：国立编译馆，1932年，第114页。

③ 国际联盟《中国教育之改进》，南京：国立编译馆，1932年，第115页。

④ 国际联盟《中国教育之改进》，南京：国立编译馆，1932年，第115页。

⑤ 国际联盟《中国教育之改进》，南京：国立编译馆，1932年，第116页。

⑥ 国际联盟《中国教育之改进》，南京：国立编译馆，1932年，第116页。

⑦ 国际联盟《中国教育之改进》，南京：国立编译馆，1932年，第117页。

⑧ 国际联盟《中国教育之改进》，南京：国立编译馆，1932年，第117页。

⑨ 国际联盟《中国教育之改进》，南京：国立编译馆，1932年，第117页。

⑩ 国际联盟《中国教育之改进》，南京：国立编译馆，1932年，第118页。

科学实验器材所需经费学校无法负担的问题，考察团专家认为，中学科学教育所需的实验器材，大部分可由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自行制作，因为在自行制造的过程中，学生能认识到“科学亦与它种学问相同，最根本之问题，不在贵重之仪器，而在应用精细或简单仪器者所具之头脑”<sup>①</sup>。考察团还建议教育部设立一个科学教学委员会，聘请几位外国专家，对中国的科学教育问题加以研究，形成补救方案。第四，对于普通中学外语教学（主要是英语），考察团认为“学生应有适合于其程度之良好英文书籍，不应以内容无聊、文字拙劣之书籍充数；学生应学作简明之英文，并练习参考英文书籍”<sup>②</sup>。考察团同样建议在教育部设立一英语教育委员会，专门从事英语教育的改革研究。

考察团通过观察发现，中国的中学生在与教师相处的过程中，常常处于一种不自然的紧张状态，“除上课外，学生与教员鲜有亲密忘形之接触；团体生活太少，其责任心遂不能养”<sup>③</sup>。考察团认为，教师在学校中应树立一种理念，即“儿童第一为儿童，第二方为学生”<sup>④</sup>。另外，专家建议学校应鼓励学生在学校允许的范围内组织各类团体，积极地进行自我管理。

考察团关于中国当时普通中等教育的报告基本符合事实，但其文化价值取向还是隐含了“去美国化”的倾向，报告书里明确指出“此种教育之组织及性质，显然以美国教育制度为其模范者。”<sup>⑤</sup>由于中国缺乏相应的中学教师，所以分科制是徒有虚名。而学分制“牺牲了文化本身之整一性和普遍性”<sup>⑥</sup>，使得教育的完整性被破坏。所以，专家直言“中国教育制度弱点即在中等学校”。报告书中对“美国化”的中学教育加以批评，并认为“谓欧洲文化上之情形，与美国之情形相比，较适宜中国之需求”<sup>⑦</sup>。

## 2. 考察团对中等师范教育的分析与建议

考察团专家认为，中等师范教育的好坏，关系到整个教育体系的完整与有序。所以开展优质的中等师范教育，“实为实施任何教育改策时之重要问题”<sup>⑧</sup>。在实际考察过后，专家们发现当时中国的中等师范教育，往往重视教育学、心理学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对专业课知识的训练，这种现象在普通中学教师的培养过程中尤为突出，其所产生的后果则是“制出之教育家与年剧增，换言之，即造出大批中学教师，彼等熟稔教育学中所包含之一切学问，而对于课程表中所列之科目，则无一专长。”<sup>⑨</sup>考察团认为，欧洲许多发达国家在师范教育的办学过程中，教育学、心理学、教科书法等知识的重要性是低于学生所选择的专业课的，并再次对中国盲目照搬美国师范教育的培养模式提出了批评。

在与教育主管部门和当时教育界人士的座谈中，针对当时关于中等师范教育的热点问题，考察团的专家们也做了回答。针对有人提出师范学校生源应以初中生为主还是高中生为主、教育年限应定为几年、乡村师范学校如何办理等问题，专家们指出“最佳固为招收高中毕业生，与以一年或二年之师范教育。”<sup>⑩</sup>但这种做法短期内在中国实现并不现实，所以在过渡时代，主要还是采取初中生进入师范学校或是进入普通高中师范科的政策，对于乡村师范学校的建设，则应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由于乡村师范学校更多地是培养农村基层地区的小学教师，且生源质量参差不齐，所以应该坚持较长时间的师范教育的训练，以三年为宜。

① 国际联盟《中国教育之改进》，南京：国立编译馆，1932年，第118页。

② 国际联盟《中国教育之改进》，南京：国立编译馆，1932年，第119页。

③ 国际联盟《中国教育之改进》，南京：国立编译馆，1932年，第121页。

④ 国际联盟《中国教育之改进》，南京：国立编译馆，1932年，第121页。

⑤ 国际联盟《中国教育之改进》，南京：国立编译馆，1932年，第101页。

⑥ 国际联盟《中国教育之改进》，南京：国立编译馆，1932年，第108页。

⑦ 国际联盟《中国教育之改进》，南京：国立编译馆，1932年，第20页。

⑧ 国际联盟《中国教育之改进》，南京：国立编译馆，1932年，第125页。

⑨ 国际联盟《中国教育之改进》，南京：国立编译馆，1932年，第126页。

⑩ 国际联盟《中国教育之改进》，南京：国立编译馆，1932年，第132页。

### 3. 考察团对中等职业教育的分析与建议

考察团认为，民国的职业教育管理体系相当混乱，一个职业学校往往从属于两个或两个以上行政部门，这可能使得一个国家内出现多种职业教育学制的不利局面。另外，非教育部门设立的职业学校往往不重视普通教育的传授，使得毕业生实际水平参差不齐，而专家们指出职业教育要想取得成功“必先有普通教育为其工作之基础”<sup>①</sup>。而且，中国多数职业学校的办学理念“既不根据一种严格制度办理，又不适合国内之需要与状况”<sup>②</sup>。其教育目的与普通教育混同，使得许多职业学校学生“身在曹营心在汉”，仍希望通过获得毕业文凭进入普通大学。另外“职业科之学生与普通科之学生相比较，为数太少”。<sup>③</sup>对于这样的现象，考察团经过调查，发现并不是职业学校没有生源，而是职业学校入学考试制度不合理，例如“某一农业学校举行入学考试，投考者计六百人，及格者仅五十人”。<sup>④</sup>考察团认为“此种入学试验问题，关于实际训练方面尤为困难，余等提议应彻底研究此问题，庶几对于此种入学考试是否过于严格，甚至完全无考试之必要，方可明了也”<sup>⑤</sup>。最后，考察团肯定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对促进中国职业教育事业所做的努力，并认为专门学校应该成为职业教育的核心，在此基础上增加成人补习学校，更能发挥职业教育的作用。

考察团针对中国职业教育领域出现的问题，提出了整改建议：第一，建立一个完整的职业教育体系。将职业学校分为三级：其中，第一级学校从小学毕业生中招生，“将儿童引入职业上最初的门径”<sup>⑥</sup>。这一级的职业学校，可以是真正的职业学校，也可以是学徒制的半工半读式学校。第二级职业学校学习时间为六年，前三年进行中等教育的课程，之后再进行三年的职业教育训练。第三级职业学校学习时间为四年，可以单独设立，也可以成为大学的职业科。另外，在职业教育阶段尽力推行免费教育。第二，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法应侧重启发式而非注入式，大部分时间应专用于工厂、实验室或试验场间之实际工作”<sup>⑦</sup>。第三，对于职业学校的师资问题，考察团认为普通学科教师应具有和普通中学教师相等的受教育程度，技术专门教师“应时与从事该项职业之人相接触，或以一部分时间，躬自实习该项职业”<sup>⑧</sup>。另外，考察团建议设立职业教育专门教员养成所，这种在职学习的模式能够迅速帮助职业学校的教师提升教学水平。

## 三、《中国教育之改进》与1930年代民国教育的改进

国联教育考察团报告书《中国教育之改进》一经翻译出版，立刻在中国引起了轰动，政界人士、教育界与文化界名流。外国学者纷纷撰文评论，《中华教育界》《独立评论》《大公报》《东方杂志》等报刊也大量刊登了对考察团报告评价的文章。政界人士以戴季陶、朱家骅为代表，戴季陶认为考察团报告基本反映了中国教育的实情，其中对中等教育制度方针的分析，也具有独到之处，“此一伟大之成绩，几令人疑其非出自外国人之手笔。盖不独对于中国之国情有深切之了解，而对于中国国家与民族，尤处处显现其真诚之爱情，与素来所见之外国考察团报告书有不同其趣之者”<sup>⑨</sup>。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称赞考察团报告洞悉了中国教育的弊端，“其识见之深，信足令人景仰者也”<sup>⑩</sup>。

① 国际联盟《中国教育之改进》，南京：国立编译馆，1932年，第136页。

② 国际联盟《中国教育之改进》，南京：国立编译馆，1932年，第12页。

③ 国际联盟《中国教育之改进》，南京：国立编译馆，1932年，第115页。

④ 国际联盟《中国教育之改进》，南京：国立编译馆，1932年，第143页。

⑤ 国际联盟《中国教育之改进》，南京：国立编译馆，1932年，第143页。

⑥ 国际联盟《中国教育之改进》，南京：国立编译馆，1932年，第145页。

⑦ 国际联盟《中国教育之改进》，南京：国立编译馆，1932年，第145页。

⑧ 国际联盟《中国教育之改进》，南京：国立编译馆，1932年，第146页。

⑨ 戴季陶《中国教育之改进·戴季陶序》，南京：国立编译馆，1932年，第3页。

⑩ 朱家骅《中国教育之改进·朱家骅序》，南京：国立编译馆，1932年，第1页。

一些学界、文化界人士也表示认同考察团的观点，蒋梦麟就十分赞同考察团提出的中国的中等教育不应该盲目仿效美国而应借重于本国文化的建议，他在对考察团报告的批注中就写道“考察团诸位先生虽然坚决反对我们单纯地模仿外国，但并不劝我们复古，他们要我们利用固有的材料，以科学的方法和试验的精神，来发展我们自己的文化。”<sup>①</sup>著名的大学教授韩湘眉女士也认为考察团的报告是写实主义的，是在不具有任何偏见的前提下写成的。

另一部分教育界人士却对报告书提出了批评的意见，他们认为考察团专家之所以反对中国仿效美国的“六三三”学制、“学分制”“选修制”的原因不过是希望中国由学习美国向学习欧洲转变，他们认为美国的中等教育制度的确值得中国模仿借鉴，这是因为中美都是地大物博的国家，美国的国情特点与文化传播方式更适合中国的需要。李建勋认为国联对中国中等教育中师资培养的批评“最肤浅而轻狂”<sup>②</sup>。廖世承于1933年5月在《中华教育界》上发表文章，强调传统文化也应该向前看，模仿国外的教育模式最重要的是效率问题，“有效的模仿就是合适的模仿”<sup>③</sup>。罗廷光则对考察团提出的中国教育已经全盘美国化提出质疑，他认为当下的中国教育是受到各个方面的综合影响，并非美国独占优势。对于教育必须中国化的观点，他提出要想达到真正中国化的地步，也不必害怕什么欧洲化、美国化的……倘如自己能切实经过一番研究，则其始虽不免美化、欧化，到后来也许能化美、化欧。

应该说，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中国的知识界、教育界对外来文化的建议与批评抱有敌意的态度是受中国长期受外国文化侵略的影响的结果，而且当时的中等教育基本照搬美国的模式的结论其实也并不能得到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赞同。然剔除价值观方面的考量，国联的考察报告基本找到了当时中国中等教育存在的弊端，提出的建议也颇为中肯，所以“尽管这些中国学者对报告书中去美国化思想的想法分歧很大，但对报告书中倡导的中国化思想大多表示赞同”<sup>④</sup>。

国联教育考察团报告中对民国中学教育的批评，基本上符合实情，对于怎样提高普通中学教育质量的建议，也得到了当时教育界的认可，即便对考察团所持价值观抱有怀疑态度的学者也认为“他们对于中等教育批评的意见，大体甚善”<sup>⑤</sup>。正是由于考察团基本认清了当时中国中等教育的若干问题，所以国民政府在国内争议不断的情况下，仍致函国联秘书处，请求国联秘书处派人前往中国，共同研究国联教育考察团所拟订的中国教育改革意见如何实施。当时的教育部长王世杰也表示希望国联能派出一位专家参与当时中国教育的改革措施的拟定。<sup>⑥</sup>世文委派遣国际劳工局副局长莫列德担任此项使命，并在1934年世文委第十六次会议上肯定了国联专家对中国教育改进的帮助。

由于国联教育考察团基本找到了当时中等教育问题的“症结”，且提出的改进措施极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得到了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持，故考察团来华考察对1930年代中国中等教育的改进产生了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 中等教育相关法令的出台

早在考察团来华前，国民政府就指示“教育部对于将来国联教育考察团之建议，当予以特别之研究”<sup>⑦</sup>。考察团报告发表后，其关于中等教育的看法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1932年12月国民党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三次全会通过了《关于整顿学校教育造就适用人才案》，该法案受国联考察报告的影响甚大，当时的中央大学教授、中国早期教育行政专家夏承枫就对比了此教育法案和国联教育考

① 蒋梦麟《国联教育考察团报告书中几个基本原则的讨论》，《独立评论》1933年第40期。

② 李建勋《李建勋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72页。

③ 廖世成《评国联教育考察报告》，《中华教育界》1933年第11期。

④ 孙邦华《中国教育现代化运动中中国化与美国化、欧洲化之争——1932年国联教育考察团报告书〈中国教育之改进〉的文化价值观及其影响》，《教育研究》2013年第7期。

⑤ 钟道赞《读中国教育之改进中等教育章后》，《学风》1933年第2期。

⑥ 佚名《国联对我国之文化合作》，《中华教育界》1934年第9期。

⑦ 吴秀峰《中国与国联技术合作之经过》，《民国档案》2003年第2期。

察报告,认为两者吻合之处颇多,其中关于中等教育部分,法案同样提出了与考察报告相同的观点,即“中等教育不专重升学准备”<sup>①</sup>。

1932年12月24日,国民政府颁布《中学法》。法令第一条就结合了国联考察报告中关于普通中学培养目标的建议,强调了普通中学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发展学生身心,培养健全国民,并为研究高深学术及从事各种职业之预备”<sup>②</sup>。1935年6月21日公布的《修正中学规程》将中学教育的基本目标定为:(1) 锻炼强健体格;(2) 陶冶公民道德;(3) 培养民族文化;(4) 充实生活知能;(5) 培植科学基础;(6) 养成劳动习惯;(7) 启发艺术兴趣。<sup>③</sup>另外,关于考察团提出的严格把控新设普通中学数量的建议,法令明确指出,中学的设立、变更与停办,都需要由各级教育机关核准,并上报教育部备案,校长与教员的任用必须按照教育部规程,且呈请教育行政机关备案。

1932年12月17日,国民政府颁布《职业学校法》,其中第二条“职业学校分为初级职业学校,高级职业学校”。第五条“职业学校得酌量情形,附设各种补习班”、第十五条“职业学校以不征收学费为原则”<sup>④</sup>等具体的法令以及职业学校人事安排、教师聘用、课程设置等方面都很明显地受到了国联教育考察团报告的影响。1933年9月6日与1935年1月22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又相继颁布了《职业补习学校规程》与《办理职业学校应注意事项的训令》,完善了中等教育阶段职业教育的发展规划。

1932年12月公布的《师范学校法》同样在培养目标、学科设置、教学方法、院校布局方面考虑了考察团报告的意见。

## 2. 废除中等教育阶段的“分科制”与“学分制”

针对国联教育考察团对中国中等教育阶段分科制的批评,教育部于1932年9月起开始全面整顿普通中学教育制度,并于同年12月正式废除了综合中学制,将普通中学教育、师范教育和职业教育分别设立。公立中学只有在能充分证明其普通科年级齐全、办学设施完备并得到教育部门批准的情况下,才能附设简易师范科和特别师范科。“后来的办学实践表明,这一规定充分发挥了中学在普通教育中的作用。”<sup>⑤</sup>1932年11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行了《初中各科课程标准》与《高中各科课程标准》,针对考察团对普通中学教育中“学分制”的批评,课程标准正式取消了“学分制”,改为“时数单位制”。高中取消了选修科目,设立了公民教育科。针对考察团普通中学课时过长的批评,课程标准也对中学课时做出了修改,减少了教学时间,增加了课外活动与自习的时间。1936年颁布的《修正中学课程标准》再次减少了中学的课时,并取消了自习时数的规定,修改了劳作课程,增加了每周四小时的职业科目。

## 3. 推动了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

考察团在报告书中建议国民政府组织一支考察团赴欧洲考察职业教育体系。根据这一建议,中国职业教育考察团于1934年赴欧,并于同年发表了《教育部专员考察欧洲之职业教育报告》。这份报告详述了欧洲各国职业教育的现状与特点,与前文所列的一系列职业教育法令一起,指导了1930年代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

为了保障职业教育的发展经费,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33年制订了《各省市中等学校设置及经费支配标准办法》,规定五年内各省市中等教育经费的分配,职业教育不能低于35%。同时又规定从

<sup>①</sup> 国民党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整顿学校教育造就适用人才案》,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052页。

<sup>②</sup> 国民政府教育部《中学法》,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414页。

<sup>③</sup> 国民政府教育部《修正中学规程》,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422页。

<sup>④</sup> 国民政府教育部《职业学校法》,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412页。

<sup>⑤</sup> 李华兴《民国教育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628页。

1934 年起,中等教育阶段新增的办学经费要优先用于职业教育,若经费不足,则通过逐年缩减普通中学的经费以满足职业学校发展的需要。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养成注重生产技能及劳动习惯,以矫正过去教育徒事空谈、忽略实践的弊病,使学校毕业生,均为社会生产分子”<sup>①</sup>。

自 1932 年起至 1937 年,国民政府先后颁布了 20 余部关于职业教育的法令、规章制度,基本按照国联教育考察团报告书的构想,从职业学校独立体系设置、职业教育经费比重、职业学校学制等方面构建了一个较为合理的职业教育体系。

#### 4. 普通中学会考制度的出台

考察团报告书虽没有明确提出要改革当时中国普通中学的考试方式与毕业认证手段,但其关于提高毕业学生实际水平与加强对学生训育管理的建议则得到了国民政府的重视。加之考察团成员皆来自欧洲,而会考制度在欧洲主要国家施行已久,在中等教育领域取得了一定成就。以上种种,不能不影响到会考政策的出台。

1932 年 5 月,民国政府教育部正式颁布《中小学学生毕业会考暂行规程》,该法规规定“为整齐小学、初级中学、高级中学普通科毕业程度及增进效率起见,对于所属各中小学应届毕业原经学校考察及格之学生进行会考。”<sup>②</sup> 1933 年 12 月教育部颁布《中学学生毕业会考规程》,对中学会考制度做了修订补充和完善。首先,会考取消了体育的统一考试,将“党义”一门改为“公民”,初中的毕业会考取消了自然,增加了理化(物理、化学)、生物(动物、植物)和史地(历史、地理)。第二,更改了毕业会考成绩的计算方法,以学校各科毕业成绩(三个学年成绩的平均数)占毕业会考成绩的 40%,会考各科成绩占 60%,以此督促学生和教师注重平时的成绩。会考三科或三科以上不及格而留级的次数改为两次为限。会考有一科或者两科不及格者,也可以参加升学考试,但需要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的批准,成为试读生,直至所有会考科目通过。第三,教育部完善了各地会考委员会的组织细则,对组成人员的权责和会考程序,都做了明确的规定。

受国联考察团批评意见的启发而制定的中学会考制度,从政治的角度来说,是国民政府为控制学潮,以考试为枷锁限制学生自由的手段,但不得不说,由于教育部规定参与会考的中学如果出现成绩过低的情况将勒令其限期整顿,若整顿不利,将取消其办学资格,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整顿各学校不正当的教风、学风的作用。通过会考制度,教育部门强化了中学教学管理,从而激发了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和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因为会考的关系,请的教员都比以前认真了,那些滥竽充数不能胜任的教员,无形中被淘汰了”<sup>③</sup>。学生由于毕业的压力,自然也将大部分精力放在学习之上。因此,有学者也感叹“举行毕业会考,在教育行政上确收莫大效率。”<sup>④</sup>

受国联教育考察团的影响,1930 年代中国的中等教育出现了两点显著的变化,其影响应该说直到今天还存在,其一是中学取消了学分制,且中等教育领域不再设有混合类中学。其二是与 1932 年前相比,更合理的职业课程体系和考试制度的推行,使得毕业生的素质有所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中国中等教育的弊病。

责任编辑:朱志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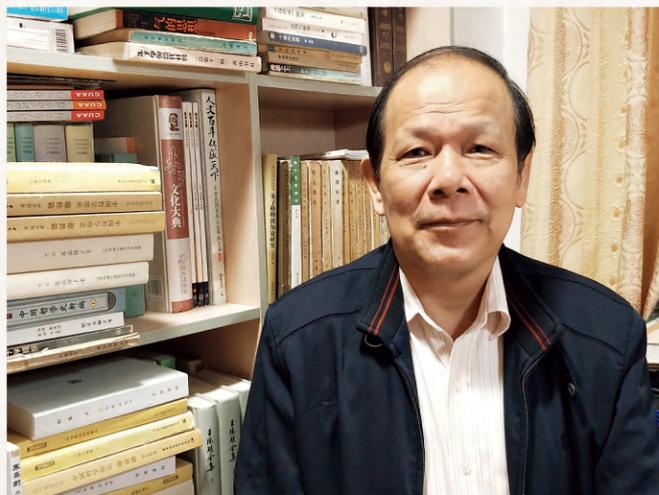
① 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专题史》第 10 卷《教育的变革与发展》,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185 页。

② 杨学为主编《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第 7 卷(民国),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169 页。

③ 孙钰《毕业会考利弊的检讨》,《教育杂志》1936 年第 4 期。

④ 李建勋《关于会考实际经验的调查总论》,《教育杂志》1936 年第 4 期。

学人  
文俊超



乐爱国 厦门大学教授



袁志刚 复旦大学教授



孙英刚 浙江大学教授



胡晓明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张学强 西北师范大学教授